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礼制、述行经济和中国式管理



RITUALS,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AND CHINESE MANAG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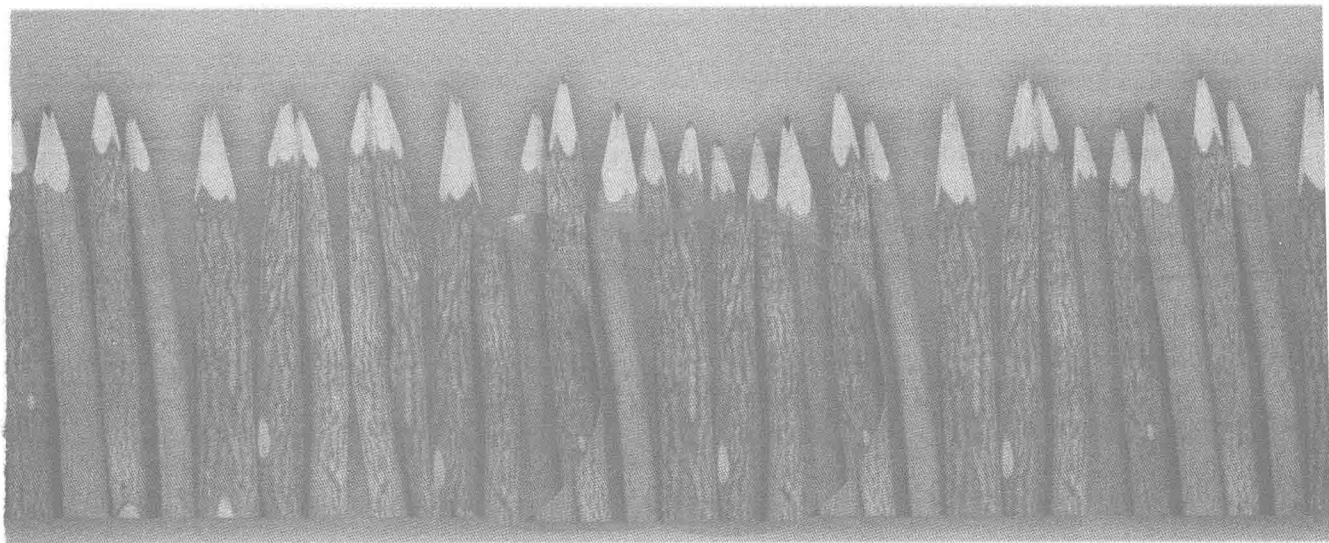
郭 曼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礼制、述行经济和中国式管理



RITUALS,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AND CHINESE MANAGEMENT

郭 曼 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认为礼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到稳定阶级层次的重要作用,并且作为一套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与制度相关的现代经济概念相连。本书通过桥接述行经济理论和本土化研究,建立了一个概念性和分析性的框架,来理解一个统一的从历史到现代的关于礼制嵌入式的企业行为和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个多元化的方法研究礼制和企业行为,即从主位与客位的角度并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其实质,强调认知分析与管理学的结合。

本书可为经济、管理领域的读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广泛借鉴,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参考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制、述行经济和中国式管理/郭曼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603-5720-1

I. ①礼… II. ①郭… III. ①企业行为—研究—中国
IV. ①F2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4570 号

策划编辑 王桂芝

责任编辑 李广鑫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 10 号 邮编 150006

传 真 0451-86414749

网 址 <http://hitpress.hit.edu.cn>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5 字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3-5720-1

定 价 32.00 元

(如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多观察家们试图探寻如下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否伴随着某种有中国特性的特殊管理模式的出现,这种模式是否被中国的商业文化所支撑。

本书根据礼制对中国企业的行为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广泛借鉴。礼制的结构允许个人、企业、企业群体通过不同的背景变化,转换不同的角色,共享相同的身份,维持相互的等级,加强和政府的联系,编制关系网络,整合特殊的文化元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企业和政府共同促进社会的变化和稳定。本书通过桥接述行经济理论和本土化研究,建立了一个概念性和分析性的框架,来理解一个统一的从历史到现代的关于礼制嵌入式的企业行为和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方法。

本书认为礼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到稳定阶级层次的重要作用,并且作为一套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与制度相关的现代经济概念相连。本书提出一个多元化的方法研究礼制和企业行为,即从主位与客位的角度并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其实质,强调认知分析与管理学的结合。首先,本书定义企业为一个自我维持礼制的系统并形成一个连贯性的整体布局,这取决于企业成员的认知根源和理性选择。本书还重点研究了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是由在企业战略互补性下存在的多种动态平衡点建构的。本书第2章提出述行理论,并借助它作为一个说明性的框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在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制度性安排下设立一个在当代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模型(第3,4章)。最后,本书认为,中国企业应链接礼制方面的知识管理并加以结合和实施。运用知识管理的理论,探讨如何将这些制度、认知和知识系统地应用到改变行为人的方式以及行为聚敛下的制度。

针对管理学的未来发展,知识管理似乎是和中国企业的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最有用的工具。知识管理侧重于植根于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企业礼制化的行为规范。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框架,希望本书能为理解中国企业性质提供一个谦卑的研究视角。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 曼
2015 年 10 月

目 录

第 1 章 理论、实践和应用	1
1.1 资本主义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多样性	1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	9
1.3 中国企业	14
1.4 组织的礼制	19
1.5 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新理解	21
1.6 本土研究	22
第 2 章 制度、企业和述行(一个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	26
2.1 述行理论简介	26
2.2 制度述行	28
2.3 企业述行	33
2.4 企业行为:制度述行和组织述行	39
第 3 章 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	43
3.1 经济学中的文化问题	43
3.2 文化、认知和制度	45
3.3 当代中国的文化案例	48
3.4 文化述行的两个案例	52
3.5 结论	55
附录 3.1 企业的 CSR 行为	58
附录 3.2 企业文化调研	68
第 4 章 中国企业的政治博弈	73
4.1 政治、法律和企业	73
4.2 惯例和国有企业	74

4.3 礼制和私人企业	78
4.4 结论	81
附录	84
第5章 基于知识理论的企业	91
5.1 认知、礼制和知识	92
5.2 知识管理	94
5.3 中国企业的知识创立	96
5.4 结论	98
第6章 结论	101
6.1 老问题的老答案	102
6.2 老问题的新答案:礼制和制度	103
6.3 前瞻	104
参考文献	106
名词索引	127

第1章 理论、实践和应用

1.1 资本主义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多样性

2007年的金融危机给管理者、银行家、律师、政治家、监管者和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批评者们带来了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次危机似乎是他们所有人一起导致的。看起来他们没有一起为大众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而努力,因为事实上更像是利益相关者们为了自己真实的利益目的去故意忘记人们真正的所想所需。而企业就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被组织和治理成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种思维并没有考虑到跨学科、跨国家的差别和个体的多样性。这些论点引导我们面对一个更有趣和更本质的本体论问题:企业究竟是什么,企业该如何运作。因为企业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制度(North, 1990),他们的自然性、起源和与经济的相关性对研究者来说变得非常重要。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却在经历着高速增长。可是在发展之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正在遇到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自由与秩序、改革与公平之间的各种矛盾。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社会,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失业人口剧增,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我们所付出的社会和环境代价巨大,追求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和短期效益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中国特色嵌入的企业管理模式似乎与很多西方和亚洲企业有着根本上的差异。首先,文化是决定中国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治理上千差万别,并都对中国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文化和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行为影响的背景下,本书探讨礼制对中国企业的作用。礼制不仅从文化方面影响个人,也维持和巩固社会结构与制度,并且将个人融入组织中(Belasco & Alutto, 1969)。这种观点为学者提供了从人性和社会两个角度研究企业行为的理论工具。本书提出一个在中国制度变迁背景下理解和研究企业性质的分析暨概念性框架,然后本书分析企业礼制的结构和功能,探索那些象征性的行为如何被用于不同公司的战略博弈,并探讨其结果对涉及企业中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作用,以及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企业行为的具体情况。最后,本书试图评估企业知识管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影响。

以下内容将先讨论世界经济理论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给当今世界管理制度带来的麻烦。

1.1.1 当今管理世界中的经济学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y of Capitalism, Peter A. Hall & David Soskice, 2001)

的一书中,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市场经济被看成两种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该框架提供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些是与经济问题关联的——好的经济表现是否就代表好的经济模式;有些是与制度问题关联的——哪种制度能更好地为经济服务,政府应该如何支持制度;有些是与企业问题相关的——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否一样,如果是,那么是什么支持着这种不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和市场分析的一个重大突破来源于16~18世纪重商主义主导西方经济思想的250年中。它的目的是通过鼓励出口和减少进口来为国家建立一个健康而富有的经济系统。这样一个系统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平衡的贸易和国家的权威力量。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重农学派或放任农业系统相比,重商主义经济制度促进企业(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并鼓励国家的控制权。

对此,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反对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黄金和白银的金额来计量的想法。他的个人著作《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亚当·斯密编写了许多关于批评重商主义学说的重要理论。首先,他认为自由地开展贸易应该有利于贸易双方的发展。他还认为,专业化生产导致了规模经济,这能帮助员工做更具体的任务;同时专业化生产也促进了科技、交通的发展,使市场更有效率。最重要的是,斯密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公众不利。由于重商主义的制度结构安排旨在帮助政府和商人阶级,放任农业,旨在鼓励所有人的共同福利,对此斯密认为,自由市场中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使社会所有人的利益都达到最大。斯密指出,个体在自由市场中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将有助于保持货品低价格,并造福于整个社会;同时这种对利益的追逐也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商品和对服务的激励机制。这种制度的概念是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继承并随后演变为新制度经济学。

根据亚当·斯密提出的想法,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家应完全专注于生产。一个紧随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社会表达的是个体间相互关系的结果而不是机械地将他们组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旨在补充其他的经济理论:它涉及资本主义的危机、剩余价值、制度的起源和进化、阶级的发展、经济政治斗争等。

通过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在英国和美国,新古典经济学主张完全专注于开放的市场,并且特别规定,国家必须首先对自己的金融服务行业开放。美国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引领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占领了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中争夺的主要领域。哈耶克指出,市场是自发的,市场不是由任何人设计的,但逐渐地演变为人类博弈行为(game)的结果。新自由主义通过鼓励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在增加承包服务和减少国家作用的同时增加私有经济成分对现代社会作用的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混合经济主要关注私有化份额以及在萧条期间政府的干预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跟随亚当·斯密的“经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如“看不见的手”)的脚步。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有句名言:经济政策

必须适应特定的国家(“有形之手”)的某些范围内的需求。他坚持,直到在德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工业增长幅度之前,自由贸易在德国是不切实际的。李斯特声称,亚当·斯密的经济体制不是一个工业系统,而是关注一个重商主义的“交换价值体系”。与斯密相比,李斯特表明,个人对主要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会导致一个健康的社会。国家还应该考虑个人的人性:包括对其历史、文化、价值观、习俗、观念和语言的关注。这些因素的统一,才是获取幸福、完成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前提。李斯特认为,私人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必须首先服从于民族利益。在倡导新兴产业受国家保护的立场上,李斯特的理论保持了经济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并帮助德国逐渐追赶上了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到了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形成协调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两大流派。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反,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引导了德国和日本的国家经济政策。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得以加速。李斯特认为,国家应把重点放在资本管制的金融市场和市场保护政策的实施上。在此基础上,德国历史学派允许市场理论在德国的“侵蚀”,但是市场的这种存在必须通过国家立法的监督和司法权的建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在“社会”市场经济名义下,自由市场理论的侵蚀带来了一个新名词:“新社会市场经济”“*Neu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Vanberg, 2004)(经济学发展历程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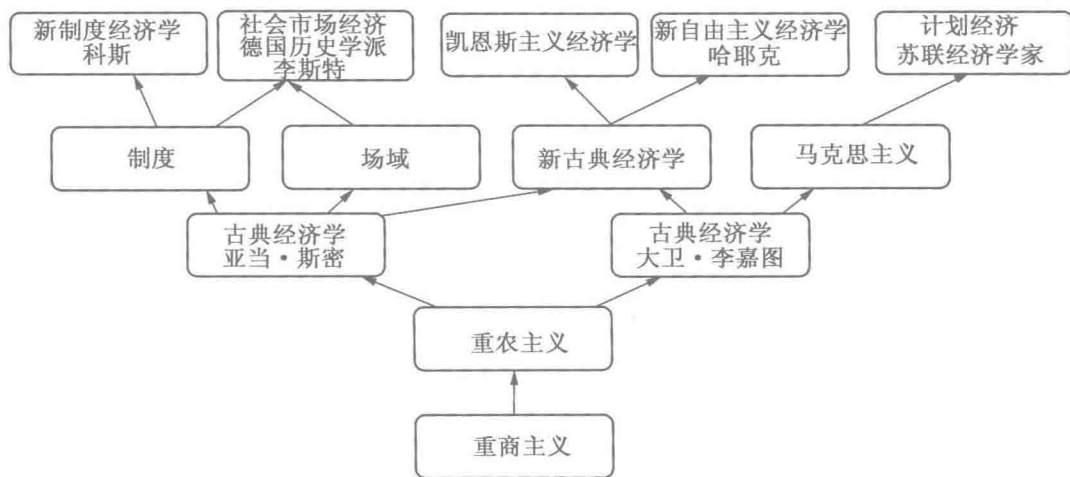


图 1.1 经济学树

从16到18世纪,重商主义主宰了西方经济思想250年。这样一个经济系统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平衡的贸易和国家的权威力量。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农业系统下的重农学派或自由放任政策相比,重商主义经济制度促进企业(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并鼓励国家的控制权。

对此,亚当·斯密整理了一些对重商主义学说的重要批评。他反驳了其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黄金和白银的金额计量的说法。市场下的制度概念是由罗纳德·科斯继承并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但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李斯

特(1789—1846)有句名言:经济政策必须适应特定的国家(“有形之手”)范围内的需求,并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引导了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国家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德国历史学派倡导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并逐步形成新社会市场经济体系。

根据亚当·斯密提出的想法,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各国应完全专注于生产。其中跟随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社会表达个人间相互关系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将个人组织在一起。

通过结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英国和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完全专注于开放的市场,并且特别规定,国家必须先开放自己的金融服务行业。以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成为20世纪主导的经济理论。哈耶克指出,市场是自发的,市场不是由任何人设计的,但慢慢地演变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混合经济主要集中于私有部分的发展和萧条期间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作用。

不管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本能地通过经济活动者的行为产生或如何由国家控制,现在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建立在一个混合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今天大多数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在描述其经济个体如何理性地参与经济活动,参与决策过程并追求利益或绩效最大化的假设下建立的(无论是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国家等)。正是基于此,理性行动理论往往作为主要的经济学框架模式去理解和解释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行为,并且扎根于微观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上。理性选择理论热衷于对数学计量方法的推崇,但对现实世界不感兴趣并随后拒绝解释其在方法论和建构效度上的不足(Colander, 2009)。这个理论在数学上是有效的,但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它无视对(理性的)人的行为的研究(图1.2)。由于这些行为的基本概念起源于启蒙或理性时代,本身很难被放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概念基于哲学性的思考,而理性模型基于自然的规范性,并取决于考量和分析的结果(Barnes, 1983)。

20世纪初的那些寻求经济现象的心理学理论基础支持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为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图1.2),如Thorstein Veblen, Wesley Mitchell, John Clark, Irving Fisher, John M. Keynes, Tibor Scitovsky, Herbert Simon, Richard Thaler等和其他人做出的显著贡献,为主流经济学提供了适当的补充。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集哲学、方法论和历史等众多元素于一体的分析框架。Wanner(1982)认为,行为经济学是“认知科学的应用”。

正如黑格尔指出:

康德说,我们应该像之前承诺的那样,去熟悉认知的工具;因为如果工具是不可靠的,我们所有的努力将是徒劳的。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已经赢得了普遍赞同和钦佩;关于其他的工具,我们可以尝试和审视它们但在其他方面给它们设置专项的工作。但是知识的检查只能通过知识的行为来进行。为了检验这个所谓的工具只能试图去了解它,就像在学会游泳之前不要冒险涉水一样,

在我们了解之前去寻求解释才是荒谬的(Hegel, 1817, in Hausman, 1992, p. 222)。

因此,从猜想到知识,采用理论实证哲学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撑可能没有完全描述所有认知行为。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从社会、认知和情感因素对个人和制度的影响,研究其对市场价格、收益和资源分配所造成的后果,并如何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一重要趋势是由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人类心理过程进行研究的结果。它使我们能够把市场经济模式放在不同的背景框架下进行研究。它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认知的了解,尤其是人类的推理和解决问题方式的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新兴研究领域提供了持不同看法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发起、组织、交流、表现的过程,而不是通过理性选择的理论中所谓的“万能”模型去了解行为变化。人们可以争辩说,理论结构的形成体现在实践的条件中,这些条件可能包括观念、欲望、信念、价值和构成社会现象的个人认知(Little,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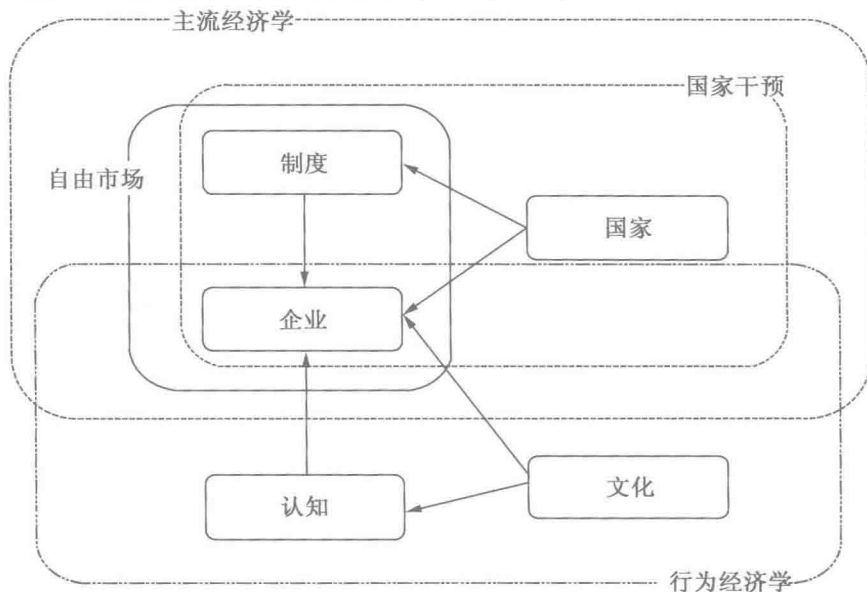


图 1.2 经济理论中的企业

主流经济理论认为:首先作为理性的行为者——人类能够始终做出理性选择和决定去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其次市场和制度总是在做自发的自我调节。经济决策者、监管机构、政府所做的选择实际上都在理性选择的可接受范围内进行。

作为经济学的新兴领域,根据所处环境不同,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观察人和企业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基于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这是很合理的,比如基于人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根本分歧可以预测出人们如何做出财务状况的不同估算、经济决策等根本的分歧,并表现出基于自身文化的各种认知偏差。

认为文化可能会影响经济制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Weber(1992 [1930])。他认为,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追随者也追溯各种不同文化如何体现不同的制度差异(Greif, 1994, 2006; Landes, 1998)。为了定位文化,如 Hofstede(2001)一样,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各种各样的调查方法去进行研究。然而,如果文化态度是在制度背景下的差异反射,它们就不能被用来解释这些环境中制度本身的差异。在这场辩论中,尤其是在国际商业研究中(Beugelsdijk & Maseland, 2011),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准则和信仰的区分已经被视为制度的来源,并引起特别的注意。

在《文化经济学》中,Beugelsdijk 和 Maseland(2011)转向文化在经济理论的历史回顾。他们在把文化定义为“制度中社会集体认同的一个子集”后,分析文化如何最初与经济思想结合起来,并逐渐从经济学消失,以及如何重新成为经济理论。在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整个 19 世纪,文化就一直作为经济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亚当·斯密、马克思或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作品中,道德、信仰和习俗自然地被认为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进步的文化组成部分。后来,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学转化成一个在通用的理论基础上决策个体的理性选择。20 世纪上半叶,文化逐步被经济学淘汰,并且外包性地被放置于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至此经济学变成了无文化理论的科学,就像 Lionel(1935)对经济学清晰而且著名的定义一样:一个纯粹关于理性选择的理论学科。

为了链接文化和经济,过去几十年学者们已经见证了文化重新被引入经济学的过程。此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Becker(1970)的涉及文化应用到理性选择在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分析。这也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指的是经济分析似乎是非经济方面生活的分析,如犯罪、法律、家庭、非理性的行为,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宗教的经济分析。第二阶段:Barro(2000)将文化融入了外源性偏好方式的分析,并进行了更多广阔的实证研究,例如使用复杂的变量集和应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等。

更明显的是,文化的分析不只是来源于他们充足的描述能力,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他们的启发和解释力,因此解释文化可以作为科学哲学理论的应用起源。基于 Beugelsdijk 和 Maseland(2011)对文化和目前的经济研究的相关性的评估,本书的建议是专注于“文化”的概念,然后尝试通过引入 Aoki(2011)的制度理论与 Searle(2010)哲学制度的概念,将个人行为 and 制度的集体意向性联系起来。对认知科学领域的触碰提供了对本质理论的研究和代表性实践的分析。该种做法将人对不同环境的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嵌入当地社区和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这种文化解释将试图用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本书想要将一个新的研究路线应用于更广的范围内,解释其深厚的起源,以及如何开辟了更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礼制相互组织起来的。因此,分析和事实调查应在中国企业管理的背景下进行评估。这种方法将有助于解释本地模式在科学发展中的应用,并链接历史和认知的理解,将主流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组合在一起。

1.1.2 理性选择和行为经济学的认知链接

在主流经济学里,制度看似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时,制度是外生性的,并被约

束在一个等级秩序中,处于经济交易之外;在其他时候,制度也被视为内生的,影响和保持博弈游戏的规则。因此,现代企业制度被指引到两个不同的方向:莱茵模式(德国和北欧的国家)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由美国和英国引领)。与19世纪亚当·斯密的带有私有制性质的小型企业 and 中等规模的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不同,无论是莱茵模式或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实际上都已经属于“混合经济”的范畴。

Michel Albert(1993)指出了莱茵资本主义的以下特点。规范的市场应该依靠银行的规管,而不是股票交易;国家应与银行密切合作,通过宏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的发展。精心调校的权利平衡也应该在股东、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存在并维持,增加相互的忠诚和信任度。此外,企业作为一个构件来共同维护和重组知识、专业化技能、技术诀窍等。企业利用这些属性,用于生产新的知识,并进一步运用于企业,最终为社会服务(Schumpeter, 1934; Penrose, 1959; Nonaka, 1991)。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认为,越开放的经济体就会产生越大的整体繁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公司治理具有市场化的风格:股东保持大量的控制。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股权融资是非常重要的,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首要目标。在这个模型中,现代化的管理有助于企业组织行为的调整,并节省交易市场中买家和供应商的成本(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完善企业活动中内部组织的结构(Doeringer & Piore, 1971; Chandler, 1977, 1990),激励内部组织成员(Hoelmstrom, 1979, 1982; Milgrom and Roberts, 1990)和发展如创业、战略决策、领导力等(Drucker, 1985; Roberts, 2004)。

在Masahiko Aoki的新书——《企业不断发展的多样性:认知、治理和制度》中,作者批评企业在自由市场理论中的管理模式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公司的组织和治理模式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利益,并追求未来预期的最大收益。另一方面,强调认知和行为的观念带给企业一个新的层面的分析。首先,Aoki(2010)认为涉及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核心的系统,其中员工、管理者和股东拥有认知的资产,即共同的信念。这些认知被认为是常识,企业因此被解释为“自我治理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的组织,并在内部将认知分发到每个人,进而指导他们的行为和工作。对Aoki来讲,公司治理表现出了企业内部管理者、员工和股东认知资产的逐步互动促进,而不是市场理论中丧失了企业道德和伦理的“股东价值”的观点。被股东、管理人员和工人共同分享的认知资产会产生一系列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方法。

利用演化博弈论,Aoki另外假定制度从“博弈状态”的平衡发展中产生。他从自由市场和国家调控两个角度总结了理性选择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来自不同背景下的企业在市场上与其他组织(如其他企业或组织、非政府组织)涉及的经济博弈;政治和社会博弈也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些博弈在改变着企业,并同时被每个企业所改变。从历史上看,这些动态博弈产生了鲜明的国家体系和制度(Aoki, 2010)。然而,博弈不应只产生一个平衡点。由于根据路径依赖理论,Aoki提到这些国家的制度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并且这是已经存在或创建中的很多均衡点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结果(Deakin, 2010)。此外,在变动的市场、技术、政治、社会的态度和认知的资产下带来新的压力,导致了在全球视野中的不同国家背景下制度景象的持续多样性(Aoki, 2010)。Aoki(2010)的意见有助于理解为

什么制度一旦建立便趋于稳定,同时对制度的起源和演化还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

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认知发生在个人的头脑意识中,如员工、管理者和股东。在这里,Aoki 进一步调查企业中“社团认知”系统和特别涉及系统中所有个体的存在方式(Deakin,2010)。在认知方面,制度涉及博弈过程里企业“公众表述”的形成(Herrmann-Pillath,2011)。根据这种表示,制度从企业互动的细节中提炼出来,以确定其持久性,并且更加突出表明内部的例行程序化的惯例(routine)功能。因此制度“存储、保留和传播共同的知识”,并被稳定的社会结构所依赖(Aoki,2010)。根据 Aoki 的解释,制度的创造力取决于使他们能够了解社会实践的安排,加强稳定性,并在同一时间寻求改变它的程度。

基于这两点,Aoki 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去了解企业和制度,并试图把他的模式引入到行为经济学中,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将行为经济学和理性经济学联系到一起。Aoki 认为制度永远处于运动的状态中,在个体的战略行动相互作用下导致的重复的动作模式;也就是说,这包括使用某些公众表达的文字、符号、礼制等方式。礼制(老规矩)精简了有关代理商间复杂相互作用方式中传达的信息,并使得这些行为引导这些状况的再现。例如,某些符号可表达权利的信号,这将被看作是法制性的,使得制度执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其通过时间重建。信息精简这个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在社会互动中分布式认知¹的一般模式的具体体现。这意味着,知识不仅存在于个体内,并且取决于一定的诸如个人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等的背景框架。因此,在制度变迁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链中,公众表达的角色被识别。制度则因此被理解为通过这些社会博弈被企业普遍接受的认知(Aoki,2010)。换句话说,老规矩可以被理解为共同的认知、信念模式和公众的表述。

从认知基础理论建立的制度演进概念将经济学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联系在了一起,并且链接了理性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从博弈论出发,Aoki(2010)的方法主要基于公司内部个体之间战略互动的微观层面,即管理。然后,他研究社会结构是如何从公司参加的互动博弈状态的平衡中形成,即制度。由于 Aoki(2010)指出,博弈论不能完全解释代理商如何协调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们的行动,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探讨“共有知识”的起源和演化,研究如何形成超越了博弈的公平制度体系。在这里,认知模式可以充分与行为经济学理论相连,并解释公司治理和体制结构的创建和重组,以及它们如何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下的变化和发展。

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指出,这项研究的重点在于制度变迁背景下企业的行为和管理。本书将尝试使用基于 Aoki 的认知科学理论链接理性和行为经济学,并研究如何处理各种管理问题和制度变迁背景下涉及的这些问题。利用这些模型,如何能为理解中国企业给出一个更合适的框架?这两种理论是相互调和或互补的吗?这项跨学科的研究将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角度看待企业。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排除现有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架构,而是希望更多地把已经被遗忘了一段时间的行为经济学包含进来。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

1.2.1 中国改革

像150年前李斯特在德国追寻的那样,1978年邓小平决定“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并打开本国经济对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大门。这一政策的影响当时从未被预测过,但是通过改革这种普遍的共识,有两个微妙的带有区别的观点逐渐出现。第一个观点认为:制度支撑可能不会自动仅仅通过立法行为和过渡路径实现,因此过程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并可能会经历不平稳的状态,这取决于每个经济体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因素。另一种观点的前提是在市场的普遍性价值和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治理模式下来探讨更深的信仰。假设是,如果能提供并实施适当的法律安排,企业、股东、个体的经济繁荣就可以自主。因此,在1984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应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后的中国领导人都强调这样做的重要性。然而,似乎没有人可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官方定义。很显然,邓小平的意图是让中国在其转型为混合经济过程中,应保持共产党在中国的核心作用;而经济成为自由市场的一部分的同时,考虑到国家经济现实的条件和它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它需要的是务实地寻求经济稳定的发展。该计划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细节,也没有人能完全估计其产生的成功或失败的影响。然而,实现现代化的愿望通过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进程逐步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与快速的繁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实体之一。

不同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德国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设想政府扮演调节市场的角色,决定价格,以方便对市场均衡博弈的指导作用(Tisdell, 1972)。此外,改革初期政府设立了4个沿海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促进出口和高科技产品进入中国。其他渐进的改革措施包括:寻求将经济特别是贸易决策权分散在几个特定部门;对各个企业的经济控制权给予省级和地方政府,允许遵循自由市场原则竞争,而不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经营;公民被鼓励自主创业等。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混合经济体,其中中国共产党起着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总体框架的核心作用。

1.2.2 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从微观企业角度来看,有两个对中国经济内部起不同功能的主要模式逐渐连接在了一起。每个模式都已经演变着并与社会的互动达成一种不同形式的平衡(Redding & Witt, 2007)。这两个模式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如今,国有企业(SOE)不再处于中央的计划控制下,并且自身涉及更复杂的结构(图1.3显示了中国国有企业商业系统的各种组织元素)。通常大型的、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国有企业需要以全球化标准来衡量。在管理方面,国有企业正在迅速改变,并具备一定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敏感度(Gurthrie, 2005)。由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国有企业也非常庞大,通过共享所有权的管理结构来吸收先进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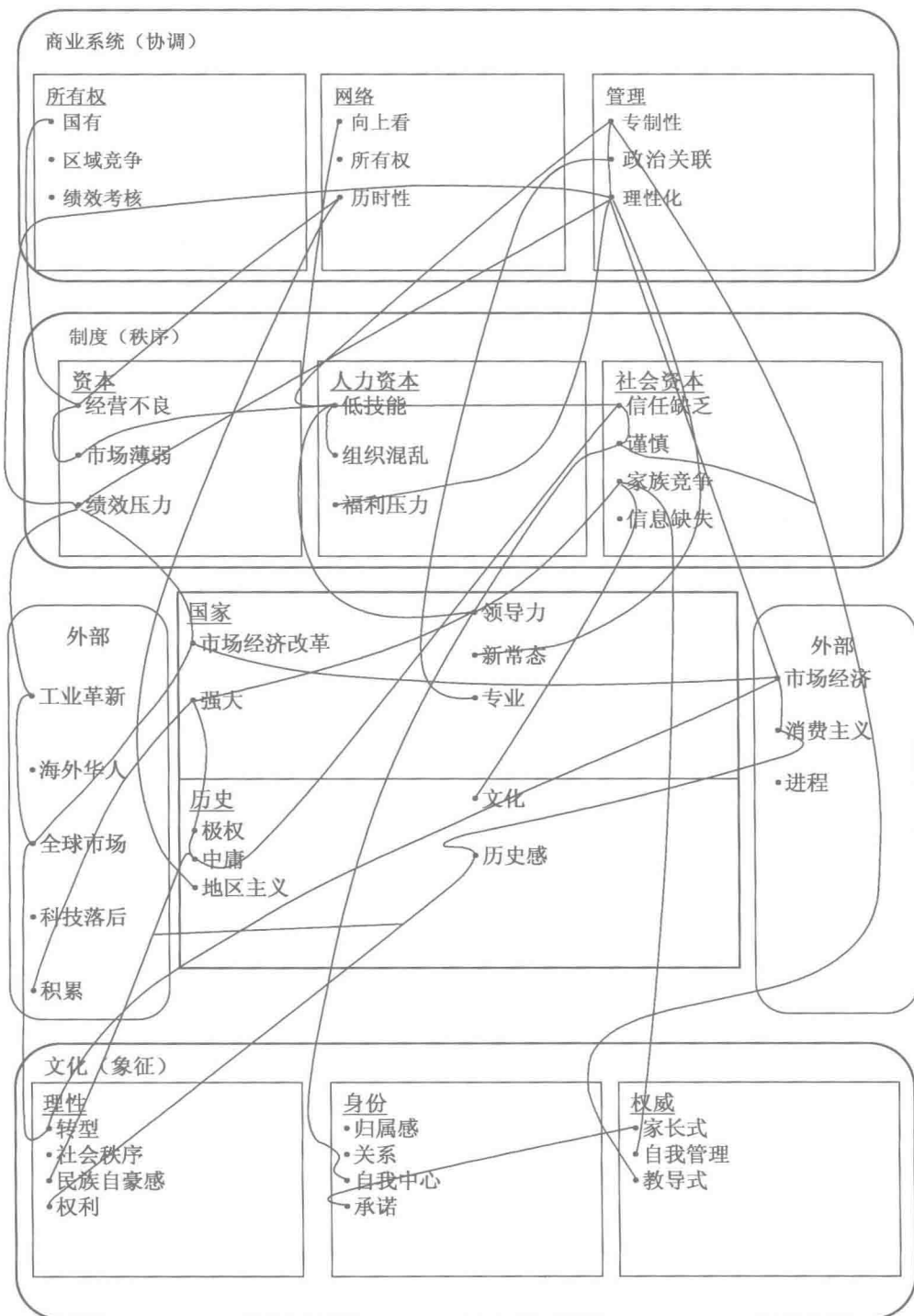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国有企业的复杂系统

引自: Redding, 2007, p. 85 (译)

在Redding 的观点中,国家仍然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对国有企业的控制。Redding 的商业系统的各个元素具有复杂的交叉关系,包含在国有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建设中。在内部,一方面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能充分符合公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缺乏内部制度化信任的系统,这反映在外部高等级的集权化和内部低级别的委托中。在外部,非正式的做法看起来很平常。例如在金融系统中,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密集度,因为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并不容易触及其他经济领域。因此文化因素可能提供的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承诺,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合格的制度。

自2003年以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指导和监督国有企业,提高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组织中,领导的角色由通过在党校的培训学习和研究的高层次政治精英组成,因此彼此具有强烈的社会化交际能力。管理人员负责传递下达的命令和维持现有的纪律。

近年来,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推动举措之一是已经实行的在不同省份下放经济权力的制度。地方自治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风险。在嵌套的层次结构体系中,政府的力量会从中央分散到省、区和乡镇村(Redding, 2005)。绩效好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银行青睐的对象。规划、金融支持和资源会流向这样的企业,但这些并不一定总是符合其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需求。这样的行为无法被测试,也无法在市场运作中被清楚地理解。因此,政策是以地方政府的经验来颁布的。同时,各个地方保护自身利益和当事人的位置。为了争取资金、资源等,每个省都必须参加在关系网中激烈的竞争。腐败成为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银行不能直接有效地支持企业融资;资源由监察委员会控制,而这又受当地政府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也因为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短缺出现了诸多问题。

综上所述,Liberalthal(2000)总结了国有企业的以下特点:

- (1)政治关系优于管理能力;
- (2)公司内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
- (3)绝对服从上级。

在这个复杂的且有等级层次的传统下,管理只能依赖于管理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密切互动。

私营企业是由大多数的小型和中型企业及具有一定背景的大型企业组成。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与制度和组织相关联,图1.4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复杂系统。在中国古代,由于宗族持有财产和权利,企业行为取决于礼制(Redding, 2007)。家庭是儒家社会的基础,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明确定义为家庭的角色,创业的目的是为了积累家庭的财富。中国古代的“家”字就是分别由屋顶和猪合成,寓意为财富的共同体。在今天中国企业家的思维空间里,遵循这一思路就意味着,无论是家人或伙伴必须一起紧密合作,为个人建立信任网络(这也被称为“关系”)。Redding(1982)看到了中国人的关系管理的重要性。Lockett(1988)也表明,中国的管理是以关系为导向的,完全与绩效导向相反。在商业方面,中国的私营企业善于分配有限的技术、人力资源和资本,商业合作被关系所加固(Sheh, 1995),并保